

关爱和 总主编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1980-2017

小说卷

关爱和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

(1980—2017)

主 编 关爱和

副主编 侯运华 杨 波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小说卷. 1980—2017 / 关爱
和主编.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672-2641-8

I. ①中… II. ①关…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近代
—文集 IV. ①I20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0961 号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
(1980—2017)

关爱和 主编
责任编辑 金振华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地址: 镇江市黄山南路 18 号润州花园 6-1 号 邮编: 212000)

开本 787 mm×960 mm 1/16 印张 28.5 字数 543 千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2641-8 定价: 80.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481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80—2017）》

编委会

主 任 关爱和

副主任 马卫中 孙之梅 王达敏 左鹏军

委 员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国安	陈庆元	杜桂萍	龚喜平	关爱和
郭延礼	侯运华	黄 霖	胡全章	马卫中
孙之梅	王 飏	王达敏	汪孔丰	王双腾
魏中林	谢飘云	薛玉坤	杨 波	袁 进
赵利民	左鹏军			

概论·文论卷

主编 孙之梅

诗词卷

主编 马卫中

散文卷

主编 王达敏

小说卷

主编 关爱和

戏剧·说唱文学卷

主编 左鹏军

序

关爱和

2017年9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在苏州大学召开学术会议。会中穿插召开理事会，讨论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性学术活动的若干事宜。所讨论若干事宜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续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之所以称为续编，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陈荒煤先生提议下，近代组王卫民、王俊年、赵慎修、梁淑安、裴效维等参与编选过一套《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其时间起止与卷帙是1919—1949年三卷，1949—1979年四卷。“续编”顾名思义就是“接着选”，从1980年续选至2017年，作为献给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成立30周年的学术礼物。

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成立于1988年。当时尚是兵强马壮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在编选学术论文的同时，1982年在开封河南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之后又有杭州、广州两年一次的学术年会。1988年，在敦煌第四次近代文学会议上，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成立。学会为民政部登记的全国一级学会，挂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与会代表推举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季镇淮、钱仲联、任访秋为第一届学会名誉会长，文学所副所长邓绍基为会长。自1988年起，学会担负起统筹学术资源、团结学术力量、共襄研究事业的责任。山东大学郭延礼、复旦大学黄霖、文学所王鹰先后担任学会会长工作。1990年在济南、1992年在杭州、1994年在广州、1996年在开封、1998年在张家界、2000年在福州、2002年在芜湖、2004年在青岛、2006年在长春、2008年在上海、2010年在赣州、2012年在长沙、2014年在天津、2016年在大理，两年一届的学术年会按部就班地进行，目前共成功举办了18届年会。学会中的许多会员组织还在年会召开的空隙时间，

穿插召开各类专题性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学术探讨的深入，带动了青年学者的成长，加强了学会成员单位的学术了解。30年间，学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近代文学新老研究者的学术之家。在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我们衷心感谢为学会工作做出贡献的每一位学者，感谢举办每一次年会和专题会议的学会会员单位。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因为你们的辛勤工作而硕果累累。

续选《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80—2017）共有概论卷、诗词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与说唱文学卷5卷，分别由孙之梅、马卫中、关爱和、王达敏、左鹏军担任分卷主编，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的领导下工作。每卷论文集的出版费用由各主编自行筹集。苏州大学出版社担负论文集出版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论文集的出版和眼下续选论文集的出版，如以编选者与出版经费的筹措为标志，80年代的编选，有着更多的官方色彩和政府行为；眼下的续编更多地体现出学术民主、学术下移、学术在民间的发展趋势。

“接着选”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近四十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从质到量的巨大变化。1980年之后，思想解放的潮流，使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挣脱“泛政治化”的牢笼，逐渐回到文学自身，近代文学作为古典与现代文学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得到确认，近代文学的学科共识逐渐达成；随着国家学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一个教育背景完整、年龄结构合理、学术传承特色明显、学术个性突出张扬的研究群体出现，并相对形成北京、上海、广州、山东、河南、苏州、西北等近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重要基地；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逐渐以新的学术眼光审视文学史实，以多元、宽容的学术胸怀，突破着研究中的禁区、敏感区，完成对过去权威的超越。中国近代文学的丰富性、整体性以及自身发展所体现的逻辑性，得到更多的认知；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更多地引起学者的普遍重视，回到文本，还原历史语境，越来越成为一种学术自觉。

“接着选”是一种对近代文学学会精神与学术传统的继承，是对近四十年来近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检阅，更是为学术的“接着讲”整理一个再出发的平台。一句话：“接着选”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接着讲”。在西学东渐的政治文化场景中，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作为中国人情感与心路历程载体的中国近代文学，其地位作用在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链条中，显得越发重要。在近百年的

精神与情感演变过程中，古与今的转换，中与西的融合，旧的毁坏，新的生成，其间蕴含着丰富的感情密码和重大的学术命题。在近代文学学科确立，思想藩篱不复存在的新时代，我们需要阅读史料，更需要独立思考；我们需要大开大合的历史宏大叙事，也需要步步为营的细心考证；我们需要与其他学科共有的价值取向，也呼唤近代文学独特的学术话语。“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这一代肯定还会努力，但把更多的希望寄托于更年轻的一代。苏州会议的另一决策是从2018年开始，学会将设立“季镇淮钱仲联任访秋学术奖”，奖励最近两年间50岁以下学者的优秀论文、论著及文献史料整理著作。因为学会与学术的发展，需要“接着讲”精神的代代传递。只有拥有年轻人，才拥有学会学术的未来。

三十而立。进入而立之年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更执着于学术的耕耘，享受着学术的收获。在《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80—2017）出版之际，愿借用上述的话，与每一位学会会员共勉。

前 言

续选 1980 年到 2017 年中国近代文学论文小说卷，是一件并不轻松的工作。侯运华、杨波博士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当我们把从四千篇论文中续选出的近四十篇代表性论文编辑成帙，展卷拜读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近四十年间中国近代小说研究中几代学者的心路历程和学术嬗递的足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近代小说的分期与性质研究

中国近代小说的分期与性质研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近代小说研究的热点。分期与性质研究，要解决的是对近代小说内在发展节奏的把握和对近代小说思想属性的宏观估评。解决这一问题，对尚在建构中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知识体系，显得十分紧要。

侯忠义是小说史研究专家。其所著《汉魏六朝小说史》《隋唐五代小说史》《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影响甚广。收入续选的论文《略论近代小说的历史分期及其特点》是 1980 年发表的，是其小说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论文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学是文学史研究领域里的薄弱环节，近代小说更是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论文依据作家思想、作品题材内容、思想倾向以及艺术特点，把近代小说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840—1994 年是近代小说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封建派小说时期。这个时期的小说主要有“侠义小说”与“狭邪小说”。进入近代的“侠义小说”带有明显的近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就是作家“把小说作为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观点和态度的有力工具”。比如《荡寇志》作者俞万春，“向清王朝出谋献策”，“主张对农民起义赶尽杀绝”，因而“全书就充满杀伐之气”。另一部侠义小说《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不满意《红楼梦》“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贾家结局，写了一个“忠孝节义”四伦全备的安家和英雄儿女性情集于一身的女主人公何玉凤，满足其“成了一篇人情天理文章，点缀太平盛世”的写作本旨。狭邪小说《品花宝鉴》写名士与男伶的同性恋爱，却写得风

雅缠绵，反映了封建文人空虚、颓废、没落的灵魂。以上是就作家思想而言。再从题材内容而言，这个时期小说发展的特点之一是：进入近代后，原来各自发展的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出现合流的现象，如《三侠五义》《彭公案》等书，其故事叙述“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这种合流，体现了乱世之中说书人与听书人对贤明政治与除暴安良行为结合的愿望。特点之二是以文人狎妓为题材的长篇言情小说即狭邪小说的出现。狭邪小说把唐人写伎家杂事琐闻的短篇，发展到多达几十回的长篇。《品花宝鉴》《青楼梦》《花月痕》《海上花列传》是这个时期狭邪小说的代表。第三个特点是，从艺术特色上去看，侠义小说多有平话习气，留有模拟说话艺术的痕迹。狭邪小说重在敷陈艳迹，不乏细腻缠绵的描写。作者之所以称这个时期的小说是封建派时期的小说，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作者政治上维护美化封建制度，思想上追求功名利禄，情趣上偏好享乐颓废，道德观上充满忠孝节义的缠绕。侯文认为：1894—1911年是改良派小说（或称谴责小说）时期。改良派小说的大量产生，并渐呈繁荣，与维新变法失败后政治变动有关，也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大力倡导有关。改良派小说的特点，一是不再粉饰和美化现实，而是对社会进行暴露和抨击。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谴责小说在对社会暴露与抨击的同时，还抱着推行改良、挽救社会的愿望。二是改良派小说的题材空前广泛。小说成为晚清社会的一面镜子，各处的溃烂，各方面的矛盾，几乎都得到暴露和反映。小说家把小说变成参与政治革命的工具。三是改良派小说揭露腐败现实，书中主要人物大都是被抨击与谴责的对象，无论内容或形式，都突破封建文艺的框框，属于资产阶级文艺范畴。稍后兴起的革命派小说思想是进步的，但所取得的成绩和影响都远远不及谴责小说。在艺术上，改良派小说因为大多以报纸连载的形式发表小说作品，因此很难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有的小说中的人物成了作者的传声筒。小说结构上多数属于短篇联缀而成长篇的性质，很多作品存在“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弊端。1911—1919年是颓废派小说时期。颓废派小说主要是指辛亥革命后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此类小说的出现，是腐败黑暗政治、堕落颓废世风与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共同造就的。鸳鸯派小说在题材内容上，大都写爱情婚姻生活，表现出浓厚的以游戏、消遣为主的“趣味性”。主要阵地是《礼拜六》，代表作品是《玉梨魂》等。鸳鸯派小说具有半殖民地的色彩。1914年盛行起来的黑幕小说更是半殖民地社会的怪胎。鸳鸯派小说采用的是一种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导致故事情节大同小异，从外国小说中借鉴而来的环境心理描写、倒叙插叙手法也渐渐成为套路。登在鸳鸯派杂志上，出自鸳鸯派作家之手的还有一些反映现实、“为人生”的作品，如周瘦鹃、叶圣陶的作品，以富有生命

力的现实主义创作，迎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

用以上较多文字概述侯文的原因，是因为侯忠义先生的这篇中国近代小说专论代表着 80 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对近代小说的认知水平。与之形成呼应之势的还有裴效维研究员 1985 年发表的《试论近代小说的兴盛与演变》。裴文开宗明义，对中国近代小说做了一个基本的评估：数量巨大而呈繁荣局面，质量不高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但近代小说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理论观念方面又在发生巨变。这种巨变奠定了近代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在古典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显示出过渡性特点，起到了过渡性作用。“对近代小说的演变过程加以探讨，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近代小说，而且有助于正确划分近代文学的发展阶段。”与侯文相似，裴文把近代小说划分为三个时期：封建小说的延续期、资产阶级小说的兴盛期、封建小说的复辟期。其历史分期及政治化用语与侯文并无太多不同。裴文认为：在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的六十年间，小说与诗文的发展存在两个不平衡：小说与时代发展的不平衡，小说与诗文发展的不平衡。两个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小说在适应与反映时代发展方面大大落后于诗文。造成两个不平衡的原因何在？在于有关小说的文学观念落后，小说对现实生活反映的意识和能力严重滞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之后，以上两种不平衡便不复存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带来的变化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改变了传统的小说观念，由“小道”而为上乘。二是扩大了小说的题材范围，关注现实社会。三是加强了小说的政治倾向性，以小说发表政见。四是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反帝反封建主题上结成同盟。五是丰富发展了小说的表现形式，吸收了外国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心理描写、倒叙插叙等表现手法。裴文称辛亥革命之后的小说是封建小说的复辟期，又从小说流派、小说观念、小说形式予以分析。辛亥革命后的小说流派可分为鸳鸯蝴蝶派、武侠、侦探、社会、黑幕小说五个部分。鸳鸯派是狭邪小说的变种。庚子之前的狭邪小说男主人公是“才子+呆子”型；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时期的男主人公是“才子+流氓”型；鸳鸯派小说的男主人公是封建才子，女主人公是良家女子，讲述的是“才子+佳人”型的爱情故事。鸳鸯派小说有一定的反封建的意义，不可简单地与狭邪小说等量齐观。此时期的武侠小说摈弃了皇帝清官，把民间的侠客作为主人公，这是一种进步。侦探小说排除了公案小说的鬼神帮助破案，又排除了侠义小说的荒唐怪诞，突出普通人的聪明智慧和逻辑推理能力。社会小说和黑幕小说同源谴责小说而向两个方向发展，社会小说有正能量，而黑幕小说则沦为“谤书”。辛亥革命后小说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小说观念上。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小说观是“游戏说”，主张以富有“趣味性”的小说作品，供读者“消闲”“游戏”。其次还有劝诫说，显

示出“小说界革命”的余响。此外，还有金钱主义的魂魄不散。这一时期的小说形式，也呈现复杂的局面。文言小说增多，四六句式滥调小说出现。有些作家，如包天笑，文言白话并有，一以兴味为主。裴文在分析各类小说的进步与退步时，是较为客观细致的，但在政治定性时，仍愿意以“封建小说复辟”这样的词语一言以蔽之。当然，裴文也提及如鲁迅的《怀旧》、叶圣陶的《终南捷径》、恽铁樵的《工人小史》作为这个时期进步作品的代表。作者认为，这些进步小说的存在，为“五四”新小说的出现做着积蓄和准备。

裴文在“结论”部分集中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近代文学学术界最为关心的几个学术热点问题：一是如何理解近代小说的发展及性质。裴文认为：“近代小说有过两次性质不同的大变化：一次发生在庚子事变以后，是资产阶级新小说战胜封建旧小说的革命性的变化；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后，是封建旧小说重新战胜资产阶级新小说的倒退性的变化。”为文学作家与作品贴上政治的标签，是20世纪80年代普遍存在的一种做法，这种做法可能牺牲了许多作家与文学作品的区别，而被简单粗暴地政治化、阵营化。在裴文中，梁启超“小说界革命”时期的小说被称为资产阶级新小说，而其前后的小说被统统打入封建小说的泥淖，这给以进化论为价值遵循的文学史的阐释者带来阐释的困难。所以，文中不惜采用“倒退”“复辟”的字眼描述辛亥革命后的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中，此为最常用的文学定性的方法与词汇。“结论”讨论的第二个热点是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裴文认为：现行近代文学史的分期，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文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文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时期文学”的三段论。这种分期对诗文来说也许是合适的，却不能反映近代小说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文学史分期既然是探索文学变化轨迹的重要方式，我们就应“按照近代小说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加以单独分期”。20世纪80年代，北京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问题，近代文学界也在广州召开学术会议，讨论近代文学分期问题。文学分期牵涉对文学史内在节奏和外在态势的宏观把握，所以被当时的研究者格外地看重。“结论”讨论的第三个热点是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征。讨论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实际上是讨论近代文学在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连接中的贡献与地位。80年代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夹在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两个研究高峰中间，势单而力薄，谦卑而渺小，只能弱弱地以“过渡性”强调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裴文以“过渡性”描述近代文学的贡献与地位时，也基本上依据上述价值判断。近代小说“它向封建小说所进行的猛烈冲击，为现代新小说运动做了一次预演：它在小说理论、小说内容、小说形式诸方面所做的探索，又为现代新小说作家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它对欧、美、

日本资产阶级进步小说的介绍和仿效，更为现代新小说乃至当代小说的欧化倾向开了先河。因此，如果我们说近一代资产阶级是封建旧小说的掘墓人，现代新小说的启蒙者，也许并不过分吧”。裴文最后借用近代小说家金松岑的话演绎为结语：“近代资产阶级小说正好比处于‘蜕化’阶段的‘青虫’，它虽然‘甚丑’，却是美丽的蝴蝶——现代新小说的前身。”

读侯、裴两篇近代小说论文，让我们回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语境之中。从中，我们更多地体会到近代文学学科的筚路蓝缕。作为亲历者，本书主编参与了 1982 年第一次近代文学学术会议和以后大部分学术会议，参与了任访秋先生主编的 1988 年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以贴政治标签的方式定性作家作品，热衷于分期的争论，以过渡性描述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这些都构成近代文学学科成长的起点。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出发，开始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续选论文集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回头检讨我们走过的学术之路和我们当年集体的学术思维、学术话语。

2004 年，时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的郭延礼教授撰文《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小说》。以郭文对中国近代小说的重新认识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侯文、裴文对照阅读，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近代文学学科的进步。郭文认为：“中国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仅因为八十年来的近代小说数量之多，要超过千余年古代小说的总和，而且近代小说在西方小说的影响下也具有了新的主题、新的思想意蕴、新的人物形象、新的结构形式、新的表现手法，以及新的传播方式。过去学界曾认为近代小说美学价值不高，没有出现像《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之类的作品，有意无意地漠视对它的研究，这实在是中国小说研究中的一大误区。”郭文从四个方面呼吁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小说。一是从小说数量上认识。日本人樽本照雄编《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创作小说 7466 种，翻译小说 2545 种，合计 10011 种。《目录》均有小说书名（篇名）、出版机构或发表报刊、出版或发表时间可查可证。如此数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是谁也想不到的。二是近代小说的整理与出版蔚为大观。近代小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出版得很少，所出版的主要是比较著名的几部小说，如四大谴责小说家的作品，以及《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之类的小说。绝大多数的近代小说没有整理出版过。90 年代后，近代小说的整理出版取得长足发展。数十家出版社所参与的数百种小说的整理出版，给读者和研究者提高了宝贵的文本。三是近代小说的研究取得进展。理论与研究范式上有较大开拓，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从宏观的角度深入探讨小说变革，如袁进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对作家与作品的研究系统深入，如颜廷亮、王祖献的研究。四是研究的不足。郭文

呼吁加强近代翻译小说、近代报刊、近代女性小说家的研究。郭文最后做出近代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不能低估的结论：“中国近代小说不仅数量大，而在质量上同样值得我们重视。”“比如说近代小说的转型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在这个总题目下，诸如近代小说的主题变化与认识作用，近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近代小说的结构艺术，近代小说语言的走向，近代小说载体的变化以及与传媒的关系，近代小说的接受主体与近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壮大，近代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近代小说与五四后的新文学等等。这些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都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从郭文提出问题的角度和认识问题的方式，以及论述语言的变化，我们是不是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中国近代文学学科走向成熟的脚步？

20 世纪 90 年代：近代小说研究的多方突围

在叙述20 世纪 90 年代近代小说多方突围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续选的 80 年代小说作家与作品研究的情况。80 年代，一些 20 世纪初出生的老一辈学者还活跃在学术界，他们的近代小说研究成果是一座座学术高峰。谭正璧出生于 1901 年，任教于华东师大。其写作于 1980 年 12 月的《论小五义》由小五义是《三侠五义》的续书入手，考证《小五义》原稿的述作者是石玉昆，刊刻时有人帮助整理。随后转入内容与思想艺术的分析。最后交代《小五义》三个版本的繁简优劣。论文结构完整，娓娓道来，显示出老一代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1909 年出生的任访秋先生，80 年代是他全力于近代文学研究的时期。他 1981 年写作的《曾朴和他的孽海花》收入续选。论文评述了曾朴的生平著述，着重分析了《孽海花》的思想与艺术，认为《孽海花》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虽然远逊于《儒林外史》同《红楼梦》，但较之并世作者，如李伯元、吴沃尧等人的作品，似乎还是略胜一筹的”。老一辈学者之后，近代文学研究队伍领头人便是 60 年代进入大学与研究机构的中年学者。首任近代文学学会会长邓绍基收入续选的论文是《从三侠五义谈侠义人物》。邓文认为：《三侠五义》是写一群侠义人物由民间行侠到归服官府，最后充当封建王朝扫除反对派和农民起义队伍先锋的故事，因此只从一般的清官审案公正的意义上，或者从一般的侠义人物抱打不平、扶危济困的角度来评论《三侠五义》，都失之片面。时任文学所近代组组长的王俊年收入续选论文集的论文是《从〈九命奇冤〉的表现特色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王文认为：如果按照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标准衡量，《九命奇冤》是吴趼人一生写过的十八部长篇小说中最好的一部，至少也不应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下。王文称赞《九命奇冤》的原因在于它和其他的社会小说一样，对官场予以彻底的揭露，同时在故事结构、人物描写、心理刻画等小说艺术表现手

法上有全面的革新与进步。《九命奇冤》显示出小说从古典向现代嬗变的轨迹。同时期给予谴责小说研究成果的还有钟贤培。其《刘鹗论辨》围绕刘鹗评价、《老残游记》评价中的不公正提出自己的意见：刘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政治思想既有救国爱民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反对革命、顽固维护清朝政权的反动的一面，而洋务救国的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主流。由于成功地塑造了玉贤、刚弼和张曜这三个不同类型的官吏的艺术形象，《老残游记》在谴责小说中成为一部能形象地暴露清末官祸与黄祸给社会带来沉重灾难的优秀作品。颜廷亮是比较早地注意晚清小说理论研究的学者。收入续选中的《晚清小说理论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标志》，就革命派关于小说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是这个年龄段的学者郭长海，熟悉小说文坛掌故，其《鲁迅与周瘦鹃》一文显示出其文趣擅长。

20 世纪 80 年代中年学者的近代小说研究，大抵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80 年代中期以后，恢复高考后读书的新一代学者在学术界崭露头角。1988 年，陈平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成为从小说叙事模式入手研究小说史的先行者。收入续选的论文《史传诗骚传统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探讨的主要范围是从梁启超小说革命之后的“新小说”到“五四”现代小说。早就有海外学者如普实克、夏志清、韩南、浦安迪注意到中国小说形式受历史著作深刻影响。陈文认为：引“史传”“诗骚”入小说，并非始于 20 世纪初；但只有到了 20 世纪初，这种广义的文体渗透才呈现如此特异的风采，促进或限制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像中国古代小说一样，“新小说”和“五四”小说也深受“史传”和“诗骚”的影响，只是各自有其侧重点：“新小说”更偏重于“史传”，而“五四”小说更偏于“诗骚”。这种侧重点的转移，使小说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也不能不波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新小说”家的借鉴“史传”，既体现在其实录精神，也体现在其纪传体的叙事技巧。真正最能体现“新小说”家取法“史传”传统的，是其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以小人物写大时代的结构技巧。而是这一点，既促进也限制了中国小说叙事角度的转变。“史传”传统使“新小说”家热衷于把小说写成“社会史”；而为了协调小说与史书的矛盾，作家理所当然地创造出以小人物写大时代的方法。倘若作家把历史画面的展现局限于作为贯串线索的小人物视野内，小说便自然而然地突破传统的全知叙事——实际上，《老残游记》《邻女语》《上海游骖录》《剑腥录》等小说正是这样部分成功地采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史传”传统间接促成了小说叙事角度的转变，可也严重阻碍了这种转变的完成。作家们往往为了“史”的兴趣而轻易放弃这种很有潜力的艺术创

新的尝试。如果说“新小说”家看重“史传”传统，“五四”作家则无疑突出了“诗骚”传统。“五四”作家引“诗骚”入小说的艺术尝试，不单为20世纪中国文学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抒情小说，而且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五四”作家把“情调”和“意境”作为判定小说优劣的重要标准，大多不大善于编故事，却善于捕捉一种属于自己、并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有“情感”。引“诗骚”入小说，突出“情调”与“意境”，强调“即兴”与“抒情”，必然大大降低情节在小说布局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突破持续上千年的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传统小说模式，为中国小说的多样化发展开辟光辉的前景。

陈平原《史传诗骚传统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从史传与诗骚审美对新小说、“五四”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入手，谈近代小说是如何植根于传统的，王祖猷的《外国小说与清末民初小说艺术的近代化》则从外国小说影响的角度谈小说艺术的近代化，讲述近代小说是如何实施“拿来主义”的。王文认为：清末民初小说思想上有新内容，艺术上不仅仅是“旧瓶装新酒”，也存在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与外国小说的译入有关。在翻译小说的影响下，清末民初小说变化有四：章回体的突破与新体短篇小说的产生，小说叙事角度与叙事时间的变化，“联缀短篇”无中心人物、事件作线索的结构改善，清末民初小说人物描写艺术的提高。

陈、王两文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末，但他们的研究带动了90年代后小说研究的多方突围。1993年起，栾梅健教授和他的团队开始注意从社会制度层面探讨近代小说繁荣的原因。收入续选的《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是其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系列论文的代表作。栾文认为：随着我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和出版制度的形成，20世纪的中国作家第一次破天荒地可以通过自己的精神产品直接得到经济上的报酬。稿费是我国近代商品经济的产物，也是文化市场中的一个具体标尺。近代之后，是稿酬制度造就了现代一大批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家和准作家。他们带给20世纪中国文坛的固然有金钱的消遣的一方面，也有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一方面，但最为内在的，则是他们的存在，为实现文学观念的新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近代小说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袁进把目光投向晚清小说读者的研究。其《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认为：上海是中国近代最为现代化的城市，它又是中国通俗小说出版的最重要基地，它的都市化过程与通俗小说的崛起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典型。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在“小说界革命”后，上海的小说种数如洪水一般增长，晚清的小说数量激增，其中大部分都出版于上海，而且都在进入20世纪后。晚清最著名的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除了《新小说》第一年在日本

编辑、在上海发行外，其他杂志都在上海编辑发行。以“政治小说”为本位的“小说界革命”成为一场应者云集的小说运动，其读者既有士大夫又有市民。晚清大批士大夫阅读通俗小说帮助通俗小说崛起，却混淆了原先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造成雅俗合流的局面。晚清小说表现的实际上是市民意识与士大夫意识的结合。大批士大夫介入小说，小说的作者与读者之后，市民小说也就“雅化”了。此时出现的鸳鸯蝴蝶派不完全是一个通俗文学流派，至少在民国初年，在雅俗的合流中，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小说的水平。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改良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激进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如提倡白话文、吸收外国小说影响等。当“五四”新文学问世之后，鸳鸯蝴蝶派才完全转入通俗文学。中国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又再次分明起来。袁文发表于2001年，其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与20世纪80年代的相比，其进步已不可以道里计。

范伯群晚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成绩斐然。2006年，范先生发表《〈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影响很大。范文认为：我们考察中国文学的线路图，从文学的古典型转轨为现代型时，是要有一个鲜明的转轨标志的。经过反复的勘测与论证，选定《海上花列传》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站点。论文列举《海上花列传》的六个“率先”，说明它在文学创作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海上花列传》是率先将目光投向“现代大都会”的小说，是以商人为贯穿人物的小说，是以乡下人进城为题材的小说，是以吴语苏白为主的方言小说，小说首先在结构上使用“穿插藏闪”手法，作者韩邦庆自办期刊，自写小说。缘于以上六个“率先”的存在，《海上花列传》可以被看作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换乘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点。

《海上花列传》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换乘点、现代文学的起步点，尚需要假以时日。与范伯群先生一起进行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汤哲声教授2001年发表的《蜕变中的蝴蝶》，专论民初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汤文所论及的民初小说是指1911年民国建立以后至20年代初“五四”新文学登上文坛以后这段时间内中国传统作家所发表的小说。其所言价值取向是指民初小说创作倾向和创作模式的变革。论文认为：创刊于1914年的《礼拜六》杂志，发表过民初所有重要小说家的作品，以至于后人称民初小说家为“礼拜六派”。礼拜六派宣言写“高兴时游戏和失意时消遣”的小说，其小说类型可分为社会伦理、描写国难、言情与翻译小说，礼拜六小说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在游戏、消闲和趣味之中达到“警世觉民”的效果。民初小说的消遣趣味观是和《三言二拍》一脉相承的，它来自于中国的传统，又得到了时代的强化和确认。这一价值取向，在民初文人

办刊与写作的实践中，体现为“副刊意识”。作者认为，民初的文学期刊，大多由报纸副刊演变而来。副刊除了作为报道新闻、指导舆论的“正刊”的补充之外，还承担着扩大报纸影响，争取更多读者的任务。而副刊的优劣则又和能否吸引读者紧密相连。当副刊逐步地演变成文学期刊之后，办刊人的编辑思想中的副刊意识并没有发生改变，他们是用编副刊的方式编小说，以副刊的文字要求写小说，游戏、消闲、趣味的副刊定位和意识极大地影响着小说创作的倾向。民初小说并没有多少启蒙意识，但对现实社会生活领域正在发生的悄悄的变化却十分感兴趣。他们非常敏感地将正在变化中的生活写入他们的小说之中，并从中表达出他们的文化观念。汤文以《小说画报》为例，分析民初小说叙事模式的变化趋势：民初作家用第一人称写作已非常普遍；全知叙事之外，人物叙事视角增加；小说叙事中心之外，人物命运的性格中心、社会问题的背景中心占比增加；倒叙与交错叙述的叙事结构增加。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模式并没有在他们手中建立。他们未能从以写事为中心走到以写人为中心上来。汤文认为：“五四”新小说的价值取向与晚清“小说界革命”是一脉相承的。处在“小说界革命”与“五四”小说之间的民初小说，很难说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继续，更难说是“五四”新文学的铺垫（或前奏）。民初小说在小说文学功能开拓和表现能力提高方面，为传统小说走向现代化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收入续选并以民初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还有黄霖的《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郭浩帆的《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铁群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刘大先的《清末民初京旗小说引论》。黄霖论文中所说的“旧派”小说，指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黑幕派小说。黄文认为：民国初年的所谓“旧派”小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呈现了难得的多元性、平民性、自由性与趋新性，是中国小说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旧派”小说具有坚主兴味第一、坚持传统路数、坚守社会责任的特点。在分析作品、论证主张的基础上，黄文认为：“旧派”小说家并不旧。他们在晚清小说界强调内容“革命”的道路上，救弊补偏，更弦改张，宣扬“兴味第一”，小说为百姓人生的娱乐、消闲服务，自有其积极的意义。当时小说界的论争，实质上是“载道派”与“艺术派”、是坚持传统与全盘西化之争。假如当时双方能取长补短，和衷共济，而不是专作门户标榜之见，相互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话，或许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就更有一点民族的气派，而不会被人说是“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了。郭浩帆的《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认为：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是报刊小说时代。这个小说时代有两个主要特征：近代小说产量的消长与报刊业的盛衰始终保持着密切甚至是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小说杂志始终是小说和小说理